

1550

费定选集

早年的欢乐

人民文学出版社

费定选集

早年的欢乐

左海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К. А. ФЕДИН
ПЕРВЫЕ РАДОСТИ

根据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俄文版(1950)译出。

封面设计：肖万庆

早年的欢乐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300,000 开本850×1168 壶米 $\frac{1}{32}$ 印张 13 $\frac{3}{4}$ 插页2

1983年2月北京新1版 1983年2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5,000

书号 10019·3410

定价 1.25 元

译 本 序

康士坦丁·亚历山大罗维奇·费定(1892—1977)，是苏联十月革命后成长起来的老一代著名作家。他以自己漫长一生的辛勤创作劳动，写下了七部长篇小说，数十种中篇和短篇小说，大量的特写、评论和回忆录等，为苏联文学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费定出身在革命前俄国外省一个小康的商人家庭，父亲是一家文具店的老板。未来的作家在自己的家乡——伏尔加河岸风光绮丽并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萨拉托夫市度过童年时代。他从小富有正义感，一九〇五年曾参加罢课以抗议反动当局对起义工人的血腥镇压。一九一四年春，费定在莫斯科商业学院经济系毕业，为了进一步掌握法语，赴法国纽伦堡留学。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在归国途中被德国当局作为侨俘扣留，先是在德累斯顿，后来又到了萨克森和西里西亚。在此期间，他为了维持生活，当过俄语教员，乐队提琴师，合唱团员和舞台上的配角等。

一九一八年初，费定在异邦听到沙皇被推翻及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深受鼓舞，并受聘当了苏维埃政府首届驻柏林大使馆的译员。同年秋天，他被作为第一批交换的战俘，回到离别已经四年多的祖国的怀抱。此后，他先在莫斯科的教育人民委员部

里工作了一段时间，不久重返故乡，担任塞兹兰市的苏维埃机关秘书，负责编辑《塞兹兰公社社员》报，还创办过一个地区性的文艺月刊《回声》。一九一九年秋天，他应征入伍，被派往彼得堡参加反击白军尤登尼奇的进攻，最初在红军的一个独立师主管四个团的书报供应，数月后奉调担任第七军《战斗真理报》的主编助理，直到国内战争胜利结束。

费定从童年时代起就对各种艺术具有浓厚的兴趣。他七岁开始习音乐，拉得一手好提琴；萨拉托夫市博物馆陈列的古今各国名画，常常使得他留连忘返；中学快毕业时，他曾两度离家外逃，以反对一心要他学做生意的父亲。上大学时，他已立志要当作家，所以把课余的时间几乎都用在阅读各种文学名著和练习写作上，并从一九一三年起，陆续在报刊上发表诗歌和讽刺小品。此后，无论在流落德国期间和国内战争的紧张战斗岁月里，他都从未中断过文学创作；而且很快地显示出自己的艺术才华。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基谢尔叔叔》(1919)和《果园》(1920)，不但分别获得俄罗斯通讯社和莫斯科文学家之宫的征文奖，而且引起了高尔基的注意。一九二〇年，高尔基读了这些作品后立即邀请素不相识的青年作者到自己在彼得堡的寓所作客；两人从此结下深厚的友谊，一直保持密切的交往。费定后来写了两大卷的长篇回忆录《高尔基在我们中间》(1934, 1944)，生动地记述了这位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老前辈对自己长期的、多方面的热心帮助。一九二〇年底，国内战争结束后不久，费定即从红军部队复员，终于实现了做一名专业作家的愿望，他从此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献给了文学创作事业。

费定是苏联成绩卓著的语言艺术家，但他的道路是曲折的。

他是在不断的探索中前进的。

一九二一年，费定在彼得堡参加一个叫“谢拉皮翁兄弟”的文学团体，直到一九二六年这个团体宣布解散，始终是它的积极成员。“谢拉皮翁兄弟”是个同路人作家组织，它政治上拥护苏维埃政权，但又持某些怀疑态度，艺术上崇尚形式和技巧而忽视创作的社会功能，带有脱离政治的“纯艺术”倾向。费定二十年代的一些主要代表作，如短篇小说《一个早晨的故事》(1921)、《放牧者》(1926)等，中篇小说《安娜·季莫菲耶芙娜》(1922)、《特朗斯瓦尔》(1926)等，特别是长篇小说《城与年》(1924)和《兄弟们》(1928)，无论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是矛盾的。这些作品都以十月革命前后俄国社会的根本变革为题材，揭露地主资产阶级的腐败，歌颂无产阶级的胜利，肯定布尔什维克对革命的忠诚，多数画面广阔，人物个性鲜明，描写细致，显示了作者的政治热情和艺术才能。与此同时，它们又片面地渲染人性的复杂，把革命者写成“恨”的化身(《城与年》)，鼓吹艺术家只有同革命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创作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兄弟们》)，这显然是错误的。此外，这些小说在艺术上常常人为地制造离奇曲折的故事情节，带有故弄玄虚的形式主义特点。所有这一切，无疑说明费定当时的世界观仍是小资产阶级的，同时也是受到“谢拉皮翁兄弟”矛盾、复杂的文学艺术主张影响的结果。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费定曾经接连两次出访欧洲，到过挪威、荷兰、丹麦、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许多地方。处于经济危机时期的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矛盾，及其种种反动、黑暗的现象，从反面教育了作家，使他的创作探索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费定在三十年代完成的长篇小说《盗窃欧洲》(1933—1936)和《阿尔克图尔疗养院》(1940)，生动地表明他思想艺术上的进一步成

长。《盗窃欧洲》主要描写荷兰一个大资本家到苏联做生意的经历；《阿尔克图尔疗养院》讲的是一个苏联工程师在瑞士疗养肺结核病的故事。在这些作品里，作者都根据精密的构思，成功地把“被忧患压迫的西欧生活场面”同“正在进行轰轰烈烈建设的苏联新社会”进行对比，既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畸形、丑恶，又展现出社会主义新生活的欣欣向荣和苏维埃人新的精神道德面貌。两部长篇小说有一个共同缺点，那就是同反映欧洲现实的画面相比，对当时苏联社会新人新事新思想的艺术描写比较简单、草率，读来好似一般的政治宣传，感染力不强；在《阿尔克图尔疗养院》里，还因为作者过分注意苏联工程师渴望恢复健康的个人感受，因而削弱了这一重要形象的社会典型意义。

在一九四一年夏天开始的整个反法西斯卫国战争期间，费定同多数苏联文艺工作者一样，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奔赴战火纷飞的前线，“到过前方同敌人进行搏斗的许多城市和乡村”，和祖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战争一结束，他又以《消息报》记者的身份参加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六年在德国纽伦堡举行的国际军事法庭对战争罪犯们的审判。他在这几年里发表的剧本《感情的考验》(1942)，以及《解放了的奥廖尔地区》(1943)、《会见列宁格勒》(1944)、《纽伦堡的审判》(1946)等一系列短篇小说与特写，几乎都是根据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写成。这些作品及时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和经过不屈斗争取得的光辉胜利，控诉了法西斯侵略者的凶恶残暴，揭示了他们最后的狼狈覆灭。

反法西斯卫国战争时期的经历，大大丰富和加深了费定同祖国人民及其社会主义生活的血肉联系。在这场“关系到全人类命运”的战争中，苏联人民的重大胜利和猖狂一时的希特勒匪

徒的可耻下场，还进一步开阔了作家的眼界，使他对十月革命后祖国历史进程的本质，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布尔什维克党在祖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都有了比较全面、具体和深刻的认识。费定当时在一篇《自传》中曾经这样写道：“当祖国的命运经受了战争考验的时候，我的一个信念比以前更加牢固、坚定了，那就是：俄罗斯生活的前途是同它的苏维埃制度分不开的，应该承认，现时代真正重要的主人公是共产党人。”^①正是这种通过切身体会对现代生活过程本质的认识上的加深和提高，使得作家的思想艺术探索更上一层楼，有了重大的新开拓。费定在战后发表的三部长篇小说《早年的欢乐》(1945)、《不平凡的夏天》(1948)和《篝火》的第一卷(1961)，充分显示了这一点。这三部作品，是他长期探索的总结，代表了他一生创作的最重要的成就；其中前两部曾经获得一九四九年斯大林奖金一等奖，后一部的第二卷只在一九六五年发表过一些片段，直到作家逝世还没有写完。

《早年的欢乐》、《不平凡的夏天》和《篝火》，各自都是一部独立、完整的长篇小说。同时，这三部长篇小说的故事都围绕着同一个地点——作者从小熟悉的外省城市萨拉托夫展开；它们的情节前后呼应，互相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都由一些共同的人物形象贯穿始终。所以，无论是作者本人和苏联评论界都称它们是根据“统一的构思”创作的“三部曲”。

《早年的欢乐》反映的全部事件都发生在一九一〇年。当时，由于一九〇五年第一次革命的失败，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地下活动遭受摧残，普通劳动者不得不继续在死亡线上挣扎，不无

^① 《苏联作家》第二辑，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第五七三页。

善良愿望的知识分子被迫陷入苦闷和彷徨之中，生活中占了统治地位的是沙皇政权的忠实奴仆——检察长、法官、宪兵以及现代化的富商和虔信上帝的房产主；所有这一切，正是革命处于低潮时期旧俄社会的真实写照。《不平凡的夏天》的故事则发生在一九一九年。这里，原来那个窒息人的旧制度已被朝气蓬勃的苏维埃政权所代替，妄图复辟的反革命势力经过布尔什维克率领的工农红军的英勇反击而遭到可耻的失败；而这一切，又正是十月革命后最初几年历史的本质过程。《篝火》的全部情节都集中在一九四一年。它卷首引用一句古谚“风吹灭了蜡烛，也吹旺了篝火”作为题词，在已完成的第一卷里，既揭示了战前肃反扩大化、农村落后及对战争缺乏准备等等客观事实所造成的种种复杂性，又展示出苏联优秀儿女战胜突然入侵的德国法西斯的决心和勇气。无论在反映时代和塑造人物方面，三部曲都显示了作者较高的艺术技巧；费定笔下的时代的形象，是比较真实、丰满和深刻的。

从本世纪初到四十年代的三十余年，时间并不算长。但这中间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完成了两次重要的革命——推翻沙皇统治的二月革命和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十月革命，在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成就之后又出现了个人迷信和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这是俄国历史发生翻天覆地的根本变化的三十余年，是极其伟大而又相当复杂的三十余年。真实地揭示这个时代的客观过程，应该说是当时苏联文学的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为此，费定颇费了一番匠心。三部曲巧妙地从这三十余年中选择了三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年代作为情节开展的中心：《早年的欢乐》里写的一九一〇年是奥古绍著的斯托雷平反动统治的高峰阶段；《不平凡的夏天》里的一九一九年是艰难激烈的国内战争

决定性时刻；《篝火》里的一九四一年是社会主义苏联面临生死存亡关头的卫国战争头一年。这样，作者自己就好比站在三个骤然掀起的不同浪尖上，高屋建瓴，把波涛翻滚、奔腾向前的历史河道上前后三个巨浪之间的激流起伏及其周围的一切，都看得一清二楚。而当他把这一切落实到自己的画面上时，又是那么既气势磅礴，又精细入微，淋漓尽致。所以，三部曲尽管没有直接正面地描写那些举世瞩目的重大政治历史事件，却使人读后能清晰地看到历史前进的步伐，感觉到时代脉搏的跳动。

三部曲还为我们提供了代表当时各社会阶层的丰富多采的人物群像。而对男女主人公伊兹威柯夫和安诺奇卡这两个形象的刻画，尤为鲜明动人。伊兹威柯夫是被作者称作“建造未来生活的工程师”——共产党人的典型。这个穷教员家庭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反动的年代里受工人出身的职业革命者的启发参加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行列，经过长期地下活动和公开斗争等多方面的考验，终于成了布尔什维克党的优秀领导干部。他爱憎分明，情趣广泛，襟怀坦白，意志坚强，三十年代末肃反扩大化时虽蒙不白之冤，仍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信心。安诺奇卡则是一个人民艺术家的典型。她来自生活的底层，始终同人民在一起，政治上受到热恋着她的伊兹威柯夫的热情帮助和支持，艺术上得到前辈专家的悉心指导，这个贫穷而水晶般纯洁的少女终于成了出类拔萃的女演员。作者在塑造这两个中心主人公的时候，不仅令人信服地表现了其性格的发展、成长过程，而且通过细腻深刻的心理描写揭示了他们优美可爱的精神世界。三部曲里的拉戈津、茨威士欣和巴斯土霍夫，也都是贯穿情节始终的重要人物形象。拉戈津是久经锻炼的老布尔什维克，伊兹威柯夫走向革命的主要引路人，可是在革命取得了胜利担任重要的职

务后，他却变得苟安自私起来，对自己的战友和同志伊兹威柯夫冤枉受审查置若罔闻。演员茨威土欣和剧作家巴斯土霍夫原是一对好友，由于世界观和对革命的态度不同，结果走了完全相反的道路：前者认为艺术的使命在于为群众服务，后来在火热的人民革命斗争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后者以“纯艺术”的代表自居，实则卑微自私，国内战争时一度混迹于反革命阵营，之后又一直追求个人的小天地，后来卫国战争爆发，他终于被历史的洪流所淘汰。这三个不同的人物形象，显然都是有现实生活依据的，所以也是有意义的。三部曲在描写人物时有一点美中不足，那就是对拉戈津后来蜕变的社会根源和个人根源没有作进一步深入的发掘，使这个重要的人物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他的说服力。但总的说来，费定这三部长篇小说里所塑造的大多数形象都是比较成功的，既具有深刻的典型性，又具有独特丰富的个性，栩栩如生，使人难忘。正是通过许多不同道路和不同性格的艺术典型，使得三部曲所呈现的既伟大又复杂的时代的形象比较真实和比较完满、深刻。

此外，三部曲还具有画面广阔，色彩斑斓，情节曲折而自然，语言精确而清雅等艺术特点。

费定于一九五八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从一九五九年起到，他还是苏联作家协会的主要领导人（先是作协理事会第一书记，一九七一年起改任作协理事会主席）。在一生的后二十年里，他曾就苏联文学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发表过许多演说和文章，它们有的已被收入《作家·艺术·时代》一书（1962），有的散见于各种报刊。针对战后苏联文学创作中某些固步自封、狭隘简单的倾向，他一再呼吁作家必须大胆探索，以提高创作的思想性

和艺术性，丰富苏联文学的艺术表现手法。

费定的名字，对我国年纪稍大一点的读者是并不陌生的。早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鲁迅就曾翻译过费定早期的一些小说，并指出他在“劳农俄国的作者们里，是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①。他的著名长篇《城与年》、《早年的欢乐》和《不平凡的夏天》等，在全国解放前及解放初就被译成中文出版。费定对我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也始终寄予热切的关怀和同情。

今年是费定诞生九十周年。我国决定把他最优秀的几部代表作编为选集出版^②，乃是对作家最好的纪念。他一生复杂的道路，特别是他后期的杰出成就，对正在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学而奋斗的我国作家，无疑是一个有益的借鉴。

钱善行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日

① 《鲁迅译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第八卷，第一二〇页。

② 《早年的欢乐》与《不平凡的夏天》原由作家出版社于一九六一年出版，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入“费定选集”，重印发行。《篝火》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一九八一年出版。

1

一个赤脚的小姑娘，約摸九岁光景，抱着一个嬰兒，放在膝头上搖着。她把他摸紧些，把一卷裹在破布里的嚼烂的面包糊用力堵住他张开的嘴巴。嬰兒把头扭来扭去，一双光着的小腿蜷縮到肚子边，哭得抽搐起来。

“不許再哭！”小姑娘生气地喝了一声，把嬰兒放在台阶的石板上，站起来拍拍膝盖，靠在屋子一堵晒暖的墙上，两手反背在身后，那副神气好象要說：哪怕你叫死了，我也不瞧你一眼。

这是复活节最后几天里的一天，人們已經不再游逛了，可是街道上还洋溢着节日殘留的愉快气氛，人們一方面惋惜佳节差不多完了，一方面高兴它还没有完全过去，也許还能乐一下。从下面的伏尔加河岸上，穿过木头房屋的小巷，传来醉汉們的凄凉歌声，这歌声有时低得听不見，有时又响得那么高，压倒了所有的声音——不論是远在水上的有小鈴的手风琴声，或教堂里零乱的鐘声，或是碼头上混成一片的喧嚷声。

石路上散弃了些踏碎的染色蛋壳——深紅色的，浅蓝色的，桃紅色的，还有一种是用煮过的洋葱皮染出来的暗黃色的。看得出大家把南瓜子和葵花子的壳随意乱吐，大吃榛子、胡桃和糖果，因为那些紙片和蛋壳等等，都被风从圆溜溜光禿禿的鹅卵石上吹到路上的凹处，而且刮到砌砌的人行道边上来了。

那小姑娘直望前面。这时春水氾濫，許多沙洲都給淹沒了，左面青草丛生的河岸好象移近了些，阴暗了些，那渾浊肮脏、成了巧克力色的伏尔加河，从这岸到那岸，横着一条好象用閃爍的碎玻璃鋪成的活动的阳光路，河身好象被橫切成两段。空气中散发着嫩白楊树叶的气息、河岸上游泥的甜味、阴湿的垃圾坑的臭气。蒼蠅嗡嗡地鬧着，才从牆邊飛开，又回来停在牆上。一切都充滿了春天的溫暖、春天的芳香、春天的声息、春天的砖砌的人行道上的尘埃，这些尘埃和节日的垃圾在旋風里打轉。

大自然常常经历重大的变迁，而且意味深长地用一种特别的期待状态来表示这些变迁。这种期待状态充斥在周围的一切里，也使人们激动。春天驅走了残冬，为了领略胜利的滋味，常常逗留一会儿，耽擱一会儿。她揚揚得意了一会儿，又繼續往前走去，可是这种停留是非常美妙的。大自然常常自顧自盼地说：我为了一次又一次使自己煥然一新，我不断地做着同样的事，这是多么好啊！

春天这种瞬息之間的顧盼，这小姑娘也深深感受到了。她生着一双跟那淡色头发不很相称的深蓝色的眼睛，眼睛很大，不甚灵活，比一般年龄相仿的小孩子的眼睛要深沉一些，因此她的眼神，显得分外凝注。小辮子有一指头长，用一条紅带子束着。褪了色的小黃花衣服，洗得干干淨淨。

嬰兒一直在号哭，而且摆动着两条腿，可是小姑娘却不能把眼光从那看不見的某一点上移开去，这一点上什么都没有，但也許包罗万象——歌曲、鐘声、大河和河上面的太阳、树的气息和蒼蠅的嗡嗡声。

她忽然轉过头去。

在静悄悄的街上，传来得得的蹄声和铁鞋在鹅卵石上的响

亮的声音。一匹有斑紋的灰雄馬，身上披一块边上垂着流苏的蓝网布，放开步子，拖着一輛輪胎打足了气的輕馬車飞奔过来。馬車夫是夏天打扮，穿一件白外套，两只手伸在前面，搖着中間系着几个绒球的抖动的蓝色綬繩。他在小姑娘前面的台阶边勒住馬，两个乘客从从容容地走下了馬車。

第一个走出来的乘客披一件黑斗篷，用一条两端是獅子嘴銜住的小金鏈扣住；头上戴一頂軟軟的黑礼帽，发着鴉毛般的闪光；他本人也是黑的——皮肤微黑，留着一撮剪短的漆黑口髭。第二个乘客潇洒地穿一件寬大的带绒毛的浅色呢大衣，顏色有点象豌豆色，戴一頂沙土色帽子，帽子上飾着青蓮色的綬帶。他的脸是松軟的，但仍显得年青、丰满，一副心滿意足的样子，好象塗了一层色粉，也和大衣帽子一样，輕松而有气派。

“唔，到了，”那个披斗篷的用圓潤的低音說，“就是这兒。”

两个人都偏过头去，把挂在台阶上面的鑄洋鐵招牌看了一遍：“夜店”。他們从从容容地仔細打量着那幢两层楼房的正面、那被雨打得剝落的灰泥、那窗子上有油迹的玻璃（有些地方玻璃用油灰胶住）、那裝着破下水管的低垂的屋檐。

“你怎么弄的，小保姆，”那个穿大衣的人好象說得很严厉。“你瞧，这小孩脸上发青，要哭坏啦。”

“不会哭坏的，”小姑娘回答，“他老爱叫，他是我的小弟弟。我媽媽一生下他来，他就这么叫。他們老把我們两个赶到外边来，大家討厭他。”

“你媽媽在哪兒？”穿大衣的人眨了眨眼睛，好象有什么东西在刺他的眼睛一般，他輕輕地拉住小姑娘的小辮子，問道：

“这条带子是谁送給你的？”

“媽媽給我的。她有許多帶子。她挨家挨戶搜破布，做成各式各樣的帶子。”

“做什麼呢？”

“縫軟帽，她縫了軟帽，到彼希卡去賣。”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安諾奇卡。”

“你的爸爸是什麼的，安諾奇卡？”

“碼頭上的腳夫。你們呢——先生？”

先生們交換了一下眼色，那個黑皮膚的解開斗篷，用異常圓潤的聲音說：

“這小姑娘多好，了不起。”

他用指尖點點她的面頰。

“你爸爸現在在哪兒，在碼頭上還是在家里？”

“我們沒有家。他在这兒，在夜店里。他喝醉了酒不大舒服呢。”

“好，我們就從這兒開始，亞歷山大，”那個披斗篷的人說。

“安諾奇卡，領我們到你爸爸媽媽那兒去。”

于是他擺動着飄揚的斗篷，首先走進夜店去了，安諾奇卡抱着嬰兒，跟在他后面奔了進去，那個穿大衣的丰满的人也跟着進去。

馬車夫象馬似的，斜睨了他們一眼，抬起屁股，從座位的墊子下面取出一根短柄的馬鬃拂帶，然後跳下車來，把外套的下襟塞在腰帶里面，開始細心地用拂帶拂拭蒙了灰尘的車翼。

已經成名的青年剧作家亚历山大·巴斯土霍夫，在一九一〇年的冬末，因为他父亲亡故，到了故乡薩拉托夫来領受遗产。不想他一住就住了好些日子，和市立剧院的演員叶果尔·巴夫洛維奇·茨威士欣交了朋友。

說得确切些，他实在沒有什么遗产可得。巴斯土霍夫的父亲是城里一个很特出的人物，生活乱七八糟，东闖西撞，想法掙錢，有时算是在铁路局里工作，有时又算是在机务处服务。他想試办一种廉价的報紙，甚至把第二届国家杜馬时代立宪民主党候补党员的身份都搬了出来，可是一切都失敗了。只有一件事情做得很成功——戴一頂紅帽圈的貴族便帽，把一切东西，連当初从領地运到城里来的旧式書斋家具，都抵了再抵，押了又押。亚历山大·巴斯土霍夫急急忙忙赶到父亲的宅第里来，而且就住在这古老的寓所里面，也正是为了这些家具；前些年，他就是从这儿步行着上实科学校^①念书去的。

現在，巴斯土霍夫已經有了名气，他的一个剧本在莫斯科上演，另外一个在彼得堡上演，他不再把自己看作不久以前还在追求女学生的淘气小伙子了，他自以为是个新人物；責任重大而又超人一等，因此，在熟悉的街道上，在老家的空房間里（在那些空房間里，以前他的老爸爸常常用喝酒喝哑了的嗓子咳嗽和叫嚷），想起来的許多旧事，感动着他，他一直觉得有種类乎寥寥

^① 革命前俄国六年制中等学校。一部分实科中学有七年级。数学和自然科学是实科学校的主要課程。